

文献保护 专刊

Document Protection Issue

主办：国家图书馆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图书馆报

2019年4月19日

第1期



创刊词

文献典籍代表中华民族之精神与灵魂，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树立文化自信的根基所在，它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凝聚着灿烂的文明，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既是国家文化发展的总体战略部署，也是各级各类文献保护单位的职责所在，更是我们应该肩负起的文化使命。为将文献保护与传承工作推向深入，让更多的人走近古籍经典，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与《图书馆报》联合推出《文献保护专刊》，旨在增强古籍保护意识、创新古籍推广形式、提高古籍利用率。我们希望由此搭建一个交流、展示、研究的平台，吸引更多文献保护工作者、研究者、爱好者投身于此，为推动文献保护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第四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管理人员研修班”开班

本报讯 3月28日,“第四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管理人员研修班”在天津师范大学开班。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管理处处长李晓松、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中医科技处处长贺晓路、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会长刘惠平、天津师范大学校长钟英华出席了开班仪式。

全国古籍保护工作管理人员研修班面向全国古籍保护工作管理人员开办,此前已有全国各省级古籍保护中心主任(各省馆古籍保护工作主管馆长)、各省级图书馆古籍部主任、部分高校图书馆馆长等古籍保护管理人员159人次参加了此项培训,对推动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开展、促进业务融合、提升管理水平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次培训共有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5家单位的60余名古籍保护管理人员参加,将有文化和旅游部、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的12位领导和专家授课,对2019年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期间还将举办两次专题讨论会。通过专家授课、工作交流、任务部署,将使大家提高认识、明确任务,推动2019年全国古籍保护工作的开展,为实现《“十三五”时期

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规划》的总目标积蓄力量。

开班仪式后,李晓松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动实践”为题授课;贺晓路以“中医古籍保护与《中华医藏》”为题授课;国家图书馆馆微文献部张阳以“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与我国公共图书馆珍贵典籍文献的抢救与利用”为题授课;北京大学肖琬以“古籍与数字人文”为题授课。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已经步入第十二个年头,“十三五”时期

中国古籍保护协会2019年度理事会召开

本报讯 3月27日,中国古籍保护协会2019年度理事会(一届五次)会议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近百名来自全国古籍存藏、修复保护、整理出版、教育科研领域的理事和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副会长倪晓建主持,天津师范大学校长钟英华出席并致辞。

受常务理事会委托,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会长刘惠平在会上作了年度工作报告。报告从五个方面回顾了2018年协会所取得的工作成绩,分析了当前面临的形势任务和机遇挑战。报告指出,2019年是共和国诞辰70周年,也是全面实施《“十三五”时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规划》的关键之年。协会要围绕中华

古籍保护工作大局,立足社会和行业组织的职能定位,不断创新工作思路,不断夯实工作基础,不断提升服务效能。重点要在加快推动分支机构建设,延伸行业发展触角;努力搭建行业服务平台,促进技术交流与合作;围绕古籍普查攻坚收尾,深化文化志愿服务;加强专业培训的品牌培育,促进古籍人才队伍建设;拓展公益资助筹募路径,服务古籍保护事业等方面,实现新的突破和发展。

为进一步梳理工作思路,扎实推进2019年各项任务的顺利实施,本次理事会上,协会特邀文化部原副部长周和平向全体理事作了《近些年我国古籍保护工作的实践与探

南京图书馆举办八千卷楼藏书特展

本报讯 2019年正值丁丙逝世120周年,为纪念这位近代著名的藏书家,4月12日,“家国情运——八千卷楼藏书特展”在南京图书馆开幕。此次活动由南京图书馆、江苏省古籍保护中心、江苏省图书馆学会古籍整理与文献保护专业委员会主办,南京图书馆承办,上海图书馆与浙江图书馆提供部分藏书支持。这是南图首次从他馆借展,实现了八千卷楼丁氏文献一次历史性的合展。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会长刘惠平、南京图书馆党委书记韩显红、浙江图书馆古籍部主任陈谊、南京十竹斋董事长陈卫国,及特邀专家学者、图书馆界同仁出席。开幕式由南

京图书馆副馆长、江苏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金勤主持,刘惠平、韩显红、陈谊分别致辞。

此次八千卷楼藏书特展采用实物与展板相结合的方式,分为江苏省古籍保护中心、江苏省图书馆学会古籍整理与文献保护专业委员会主办,南京图书馆承办,上海图书馆与浙江图书馆提供部分藏书支持。这是南图首次从他馆借展,实现了八千卷楼丁氏文献一次历史性的合展。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会长刘惠平、南京图书馆党委书记韩显红、浙江图书馆古籍部主任陈谊、南京十竹斋董事长陈卫国,及特邀专家学者、图书馆界同仁出席。开幕式由南

贵文献。展览现场有历史文献部的工作人员进行讲解。此外,读者还可通过扫描二维码获取更多展品信息,现场体验雕版印刷、活字印刷、钤印、抄写等多项活动。

“2019古籍整理与保护学术研讨会”丁丙先生逝世一二〇周年纪念”同日举行。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丁庆柏、南京大学教授徐雁平、浙江大学教授陈东辉、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苏苏、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石祥、天一阁博物馆副研究员李开升、国家图书馆出版部副研究员马学良等专家学者,围绕八千卷楼藏书的历史、文化以及丁氏家族做了七场高质量的学术报告。

史星宇 韩德洁 忻伟隆 尚婧

我国将斥资3亿元开展布达拉宫古籍保护利用

从西藏布达拉宫管理处获悉,自2019年起,我国将在十年内累计投入3亿元专项资金,开展迄今为止布达拉宫最大规模的古籍文献保护与利用专项工作。

据介绍,目前布达拉宫官藏在册的汉、藏、满、蒙、梵等多语种珍贵古籍文献近4万函。这些珍贵古籍文献基本涵盖了藏民族古籍文献的所有形式,内容可大致归纳为经藏、律藏、论藏等三藏典籍;大、小五明;佛本生传记;各语种医药学、史学、戏剧;各类志书、目录等。目前布达拉宫古籍文献主要存放在灵塔殿、佛殿、经堂、部分殿堂及数间古籍文献库内。

上世纪70年代,布达拉宫组织成立古籍文献整理小组,保护修复了部分古籍文献,整理出版了四部古籍文献集目录。近年来,为更好地保护利用这些珍贵古籍,西藏结合布达拉宫古籍文献实际情况,开展了原有古籍目录电子版的录入、整理以及数字化工作。

布达拉宫管理处副处长觉旦说,不久前西藏自治区文物局组织相关保护、研究力量,编制了《布达拉宫文物(古籍文献)保护利用项目预可研报告》,并提请列入中央财政10年周期专项资金支持。目前,这一报告已获得批复。

据悉,布达拉宫古籍文献保护与利用工程整体实施方案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承担,项目主要分为古籍文献可预防性保护、抢救性保护修复、数字化保护、展示利用四个部分。整体实施方案计划于近期完成,目前管理处已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参与开展前期古籍文献普查登记工作。

据新华社

天一阁藏书家底彻底摸清

从不久前在宁波召开的“天一阁所藏文献分类整理与研究”结项鉴定会上传出消息,天一阁目前藏有古籍共计2.2万种15.8万册,其中善本古籍5313种34626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天一阁文献最系统最全面的清理。

明代兵部右侍郎范钦在宁波创建的天一阁,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立藏书楼,也是亚洲现存最早的私立图书馆。天一阁藏书最多时达7万多卷,历经数代增损,一直无法确定准确数字,也无法编纂出完整准确的藏书目录,严重制约了国内外学者对天一阁文献的利用。由天一阁和宁波大学合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天一阁所藏文献分类整理与研究”历时五年,全面系统地清理了天一阁所藏文献的详细情况。

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天一阁原藏明代文献,包括方志、科举录、文集、政书等,特别是3751种明刻本。在天一阁所藏清代文献中,最有特色的是259种稿本,包括经部41种、史部44种、子部22种、集部152种。在这些清代稿本中,三分之二是从未刊刻的孤本,弥足珍贵。有些稿本上的名人手迹,更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在整理资源的同时,课题组还对文献进行了数字化收录。据统计,目前天一阁善本库中的古籍,以及所有方志、家谱、书目等特藏文献已被全部扫描,18161条数据(127911册图书)已经汇入“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供国内外读者查阅。读者除了通过天一阁官网查询馆藏目录外,还可以在天一阁阅览室便捷阅读到所藏文献的电子版,有效解决了古籍保护与读者利用之间的矛盾。

课题组在进行文献整理时,还对文献进行了多角度研究。项目首席专家、宁波大学教授龚缨晏将天一阁文献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结合起来,认为天一阁所藏《徐氏宗谱》中明代宁波人徐时进所撰《欧罗巴国记》,是目前所知最早记述欧洲的中文文献;通过天一阁文献与英文资料相结合,澄清了近代中国第一艘轮船“宝顺”轮的由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项目组在文献中发现了最早介绍西方电报知识的中文著作《博物通书》,以往中外学者一直认为这本书在中国已不复存在。

此外,课题组对天一阁所藏515种地方志全部影印出版,其中不乏精湛的善本和稀见的珍本。张含《艰征集》、林时对《蛮庵碎筑集》等数十种明清孤本著作手稿等首次公开。这些新发现,为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史料。

据“浙江新闻”

《书香联萃》:传承对联艺术 彰显民族智慧

□张志清(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

联者,古桃符也。肇于秦汉,成于唐宋,明清以降,富美兼备,郁郁乎不啻云烂星陈。其协平仄而工对仗,胜乎巧而广乎用,示劝惩者,箴铭规训也;敦谊切者,题赠贺挽也。讽咏瑰丽,壮庙堂祠宇之声色;挂缀掌故,表少儒曼倩之诙谐。于词章中虽曰小乘,然举重若轻,言简意深,雅俗共而神形备,遂能腾播街巷,脍炙艺林。

古人以积书并于积德。《荀子》曰“学不可以已”,其至重至恒,可概见矣。以书入联,其类甚多。有励风节者,曰“喜伴好书消水昼,漫夸肝胆照平生”;论学问

者,曰“商略晚窗须小醉,校雠古本莫多删”;寄闲情者,曰“湖上藕花桥上月,窗前流水枕前书”;奋鹰扬者,曰“千年战史归诗卷,满架兵书斗剑光”。雍容挥洒,各具千秋。

余辈忝居册府,守藏之外,敦诗书而臻雅化,莅职之基也。今萃书联以光弦颂,传书香以达里闾,俾好学喜书之人,偶有片暇,闲翻漫检,得盎然意兴于联中;更或自题楹柱,转馈契友,体被文质,情兼趣理,不亦雅乎?不亦乐乎?

前者,联界诸公广事襄聚,得古今联语

二十余万幅,用宏取全,成八巨帙,粲然可观。丁酉春,商请馆内同仁,本诸公所采,合所关读书、著书、藏书之联语为一编,颜之曰“书香联萃”。始任其事者,王红蕾、庄秀芬、郑小悠、冯坤、石任之、赵银芳、张波诸博士也。稿经楹联学会刘太品先生等初校,复由郑小悠、冯坤二博士反复雕校,继蒙中华书局俞国林、白爱虎贻襄编,始克付梓。毫端草草,聊致谢忱。

(本文为张志清为《书香联萃》所作之序)



全而精的楹联工具书 对话本书责编、中华书局总编辑助理俞国林

□本报记者 胡倩倩

对联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营造书香文化氛围,由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中国楹联学会共同编纂,从中国古代楹联中甄选与读书、爱书内容有关的楹联三千副左右,成《书香联萃》一书。近日,该书责任编辑、中华书局总编辑助理俞国林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畅谈了《书香联萃》一书出版背后动人的故事。

记者:《书香联萃》以“书香”为题,所选联语涵盖读书、著书、藏书等内容,是一本值得收藏的楹联工具书。作为该书责任编辑,请您分享其出版契机。

俞国林:2014年2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记者专访时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

2014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向全社会发出了“阅读中国,书香社会”的号召。2018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又指出要“倡导全民阅读,建设学习型社会”。尤其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重要论断。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全社会广泛地开展起了关于书香社会的各种活动。

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书香社会的建设中,一直是非常重要的领导力量,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出版了一系列图书。而对联这样一种富于民族特色、民族气象的文学样式,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自然是书香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图书出版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还发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关于在2019年元旦、春节期间开展“书香盈岁月,新桃换旧符”活动的通知》。

记者:《书香联萃》所收联语近三千副,在作者和联语选录上遵循什么原则?主要参考了哪些楹联资料呢?

俞国林:编者有《凡例》中明确指出遴选的标准是:“思想积极、格律工整、对仗谐巧者,尤重名家名联。”

思想指的是对联表达的内容,必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格律和对仗都是就对联的形式而言的,就是说必须在平仄格律和语言词汇方面合格。

内容积极向上的对联能陶冶人、教育人,格律协调的对联听起来顺耳,对仗工整的对联看起来顺眼,这是一副好的对联必

须具备的要求。而名家名联,基本上都是这三方面完美结合的典范之作。

参考文献最重要的是中国楹联学会编的《中国对联集成》,该书收联二十多万副,其主要的特点就是全,确实是集大成之作。

记者:《书香联萃》分为情理、题赠、景观、集联四部,各部下又包含格言、赠友、名胜、集字等15个小类。拟定这些细分标准需要沟通多方面的需求,最后是怎么确定这15小类的?您在这点上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俞国林:全书的结构和分类主要是由编者来确定的。编者先是全部诵读《中国对联集成》所收对联,然后根据对联的内容讨论形成分类名目,再精选对联按类排列。

但所选对联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大都与“读书、著书、藏书”相关。比如“读书尚友,虚己待人”“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等等。

我们接到书稿后,进行了细致的编辑加工,但主要做的是微调,比如具体对联分类的归属,比如对所收重复对联的删汰。总体而言,编者的工作是很到位的,相应地,编辑的工作也很轻松。

记者:《书香联萃》与市场上现有的楹联书籍相比,有什么亮点?

俞国林:市场上有关楹联的书大概有这么三类:

一类是实用性的,比如春联、婚庆嫁娶联,这类书的特点是实用、单一;

一类是赏析类的,比如风景名胜联、奇趣联,这类的特点是文学色彩浓厚、故事性强;

一类是创作类的,就是讲对联作法,教你如何写对联,这类书主要是讲创作,故而大多是举例性质,以写为主,而不是以联为主。

《书香联萃》的特点是全而精——全,说的是所收联语门类齐全,这从目录上就可以直观地看出来;精,说的是对联的内容和形式,包罗万象,应有尽有。一副好的对

联是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而我们遴选的原则就是从这些方面出发的。

记者:《书香联萃》由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和中国楹联学会合编,并由中华书局出版,很有权威性。您认为这本书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和推广有什么重要意义?

俞国林:对联是内容丰富、高度凝练的汉语文学艺术样式,具有很强的民族文化特色。程千帆先生在《关于对联》一文中就说过:“对联是我国文学中一种源远流长、兼有普及提高之长的,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样式。”作为一名比较合格的中国人,至少要懂得对联的基本知识和特点,要懂一点对仗、平仄、格律的知识,要分清什么是上下联,要能评判对联的高低好坏,当然最好能背诵一些对联,比如收入《书香联萃》中的对联。如果要求再高一点,那就可以尝试自己创作对联。

对联速读

情理类

(怀古联)
纵观廿四史;静对十三经。
与古人相知;集斯文之大观。
——廖润堂

题赠类

(赠友联)
有关家国书常读;
无益身心事莫为。
自研朱露点周易;
听取青光读楚辞。
——徐特立

(庆贺联)
乞罢天孙机上巧;
晒余才子腹中书。
——王闾运

(家训联)
习蒙近世译;诗礼绍家风。
闲户无闲事;传家有旧书。
——无名氏

(衰挽联)
千卷史书怀拥座;
一带风雨忆篝灯。
——无名氏

林则徐



程有庆(国家图书馆)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丛书,全书收乾隆以前的各类古籍3461种,基本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重要的典籍,代表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可以说,《四库全书》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知识体系的归纳、总结及体现。

乾隆皇帝亲自主持《四库全书》编纂工作

《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亲自主持,由纪昀等360多位学者共同编纂,先后有3800余人参与抄写,费时长达13年的大工程。如此艰难的工作,乾隆为何要时时督促,执意进行?他在《御制文渊阁记》中对此有明确的解释:

“故予搜四库之书,非徒博右文之名,盖如张子(载)所云: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道(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张载是北宋时期著名理学家,这是他最著名的话,意思是要为世界确立文化价值,为人民确保幸福生活,为文明进步传承创造的成果,要让社会有永久的太平。乾隆引张载此语,说明他对中国古代儒家胸怀广阔、关心民众的思想是有所认同的。不仅如此,他在《御制文渊阁记》中还说:

“文者,理也。文之所在,天理存焉。文不在斯乎?孔子所以继尧舜之心传也。世无文,天理泯,而不成其为世。”

这些话,充分证明传统的儒家思想在中国影响极为深远,连古代帝王也概莫能外。

《四库全书》的抄录与典藏

《四库全书》始编于清乾隆38年(1773),乾隆皇帝于当年下诏征书,命开设四库全书馆。第二年,乾隆又下诏仿照宁波范氏天一阁藏书楼“上下二层,面阔六间,各通为一”的结构样式,寓“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兴建皇家藏书楼。《四库全书》共抄录7部,自乾隆44年至49年,陆续建造了七幢样式相同的藏书楼以贮藏之,称为“南北七阁”,其中北方四部为皇家专用,分藏于北京故宫文渊阁、沈阳故宫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和承德避暑山庄文津

阁,又称“内廷四阁”;南方三部分藏于“南三阁”,即杭州文澜阁、扬州文汇阁和镇江文宗阁,主要供当地文人士子阅览。

文津阁《四库全书》 传承国学经典 弘扬优秀文化

阁,又称“内廷四阁”;南方三部分藏于“南三阁”,即杭州文澜阁、扬州文汇阁和镇江文宗阁,主要供当地文人士子阅览。

传统分类法将古代图书统分为四部,唐代的官书,就已按经、史、子、集分库皮藏,这也是中国古代藏书的传统。所谓“四库”之称,实即包含全书之意。《御制文渊阁记》说:

“而总名之曰《四库全书》,盖以古今数千年,宇宙数万里,其间所有之书虽夥,都不出四库之目也。”

《四库全书》的典藏,即按传统分为四部。为便于清点、检阅,各部依春、夏、秋、冬四季,分四色装潢。书册的用纸、装帧以及贮藏别具一格,十分讲究。纸张上,选用浙江上等开化榜纸,纸色洁白,质地坚韧,堪称上品;书册装帧上,采用绢面包背装,即将书页正折,使版心朝外,书页左右两边都向书背,用纸捻订牢,然后,以丝绸将书册前后连书背一并包裹糊连而成。

历经波折,文津阁《四库全书》终得安定

文津阁《四库全书》是七部中的第四部,成书于清乾隆49年11月,原藏于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乾隆皇帝弘历《文津阁记》写道:“欲从支脉寻流,以溯其源,必先在乎知其津。”“文津”之意,即在于此。

文津阁《四库全书》全书共103架,6144函,36000余册。经、史、子、集卷

帙,以四种颜色分别开来,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蓝色,集部灰色。每册卷首盖有“文津阁宝”,末页盖有“避暑山庄”大印。

清宣统元年(1909)7月,为筹建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清政府准将文津阁《四库全书》调拨京师图书馆使用。但1914年1月原书押运到京之时,竟被北洋政府内务部拦截,运至故宫文华殿古物陈列所。当时在教育部的鲁迅闻讯心急如焚,后经教育部与内务部反复交涉,终于在1915年归还京师图书馆。

1929年,文津阁《四库全书》随改名后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迁到中海居仁堂。1931年春,位于北海公园西侧的图书馆新馆落成,文津阁《四库全书》又随之迁入这座古色古香的宫殿式建筑。此后不久,北平市公安局根据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建议,将馆前街道命名为“文津街”。1988年,文津阁《四库全书》又迁移至白石桥国家图书馆新馆皮藏,安然宝藏至今。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统治者利用编纂《四库全书》的时机,以封建统治者标准,不仅将广受人民欢迎的戏曲、小说排除在“四库”之外,更肆意对所谓有违碍的著作实行“寓禁于征”,大兴文字狱,根据有关档案记载,很多书籍遭到毁坏,就连明末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也遭受禁锢而未能幸免。因此,我们对《四库全书》的成就,也要一分为二,要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评价。

《永乐大典》 竭尽心力,传承珍品

“写本珍品”劫后余生入藏国图

《永乐大典》是明代永乐年间朱棣下令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成书于1408年。该书按《洪武正韵》统字编排,用字系事,将记载于各典籍中涉及相关字的天文、地理、人事、名物及阴阳、僧道、技艺等内容集中抄录,堪称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同时,因其纸质洁白柔韧,四周双边朱丝栏均手绘而成,且缮写工整,朱墨灿然,绘图精美,还被誉“为本珍品”。

然而,现仅存于世的400余册《永乐大典》,是嘉靖皇帝为防治孤本毁于一旦而下令重抄的一个副本,正本至今下落不明,所幸的是该副本与正本的格式、装帧等完全一致。

这样一个正副两部共计22000余册的大型类书,经过400余年仅存400余册,实为文化史上的一大劫难。明清时期官吏的监守自盗、管理不善,致使《永乐大典》不断流失,至光绪元年(1875)仅存5000余册,到光绪二十年(1894)只剩800余册存于翰林院。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使大典遭受了最后的劫掠、焚毁,翰林院仅剩64册,后被清末大臣陆润庠运回府中暂存。其他劫余的《永乐大典》被运往英、美、法、日、俄等国,流散世界各地。

国家图书馆是《永乐大典》最大藏家,共收藏221册。国图四处征集,到1934年,达93册。而其中的60册则在抗战时期文物南运时随其他善本运往美国,最终到台湾,现由台湾故宫博物院保管。在国图《永乐大典》专制的紫檀木书柜中,特为这60册预留了存放位置。

“夹鞋样”大典得修复

新中国成立后,《永乐大典》的修复工作出现崭新局面。自1951年始,先后

有苏联的列宁格勒大学、列宁图书馆、科学院赠还共计64册大典,西德赠还3册,均由政府拨交国图;一些爱国人士和藏书单位也将收藏的大典交国图中收藏。

1983年,收藏于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家中的1册裁去天头地脚、用于夹鞋样的大典被转送到国图,这册未伤及文字的大典已被国图的古籍修复人员进行了复原修复。国图还在2002-2003年期间完成了现存本馆的161册大典的修复工作,并在建立敦煌遗书专库的同时,也为《永乐大典》特制了紫檀木书柜,使1册存放于1层抽屉内,大大改善了存放条件。

仿真大典有望全部影印出版

国图在做好原生性保护的基础上,还积极配合中华书局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永乐大典》。从1959年以来,中华书局陆续出版797卷《永乐大典》,占现存总数的99%。2002年,为配合国图举办“《永乐大典》编撰600年国际研讨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正式推出了原大仿真影印的《永乐大典》,并计划将现存的大典全部仿真影印出版。



《永乐大典》修复现场



《永乐大典》修复前

敦煌遗书 风雨飘摇路,“遗书”现真容

屡遭监守自盗遗书终返京

“敦煌遗书”就是指从敦煌地区出土的古代文书。时间上起晋末,下迄宋初,目前所知最早者为后梁麟嘉五年(393年)所抄《维摩诘经》,最晚者为《大宋咸平五年(1002)敦煌王曹宗寿编造铁子人报恩寺记》;敦煌遗书与殷墟甲骨、居延汉简和明清内阁大库档案被列为上世纪初我国的四大文化发现。

敦煌遗书总量约6万件,主要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和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等四个机构。此外,

在日本和欧洲其他国家亦有少量收藏。

国图藏敦煌遗书最初源自学部接交的劫余部分。1910年,清学部命甘肃学台将藏经洞内所有遗存全部运京。在运京途中,遗书又多次被监守自盗、再遭劫难,直至1950年,离馆的遗书才全部安全运回国图。

遗书专库落户国图见真容

为了更好地保护遗书,经国家财政部与国图商讨之后,2004年6月,敦煌遗书专库落成,一举成为全世界收藏敦煌遗书条件最好的机构,有力地回击了“劫走敦煌遗书、使其

得到妥善保管,是其幸事”的谬论。

在遗书的修复上,国图形成了一套独到的修复、保护方案,并成功完成大量敦煌遗书的修复工作,使千年文物得到妥善保护,其修复、保护方案和技艺也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肯定,并得以传播。

遗书数字化紧追潮流步伐

为方便学界利用敦煌遗书,国家图书馆精心编辑出版了百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大型图录,并与英国图书馆合作,将遗书陆续数字化,读者已可在网上免费获得高清晰图像。

《赵城金藏》 千古第一,佛教经典

崔法珍断臂成就《赵城金藏》

金代,山西潞州(今长治)年仅十三岁的民女崔法珍为做功德,毅然断臂化缘刻经,感动了众多善男信女,大家纷纷捐资协助。经书终于在1149年前后于天宁寺开刻,历时约30年完成了以北宋《开宝藏》为底本的一部大藏经的雕刻,被后世称为《赵城金藏》,也被世人誉为“千古第一发心之大藏经”。《赵城金藏》共有6980卷,6000多文字,现存4800余卷,是存世善本藏经中卷帙最多、保存最完整的一种,且世界仅存一部,其中4813卷收藏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机构有零星收藏,是研究我国印刷史和版本史的珍贵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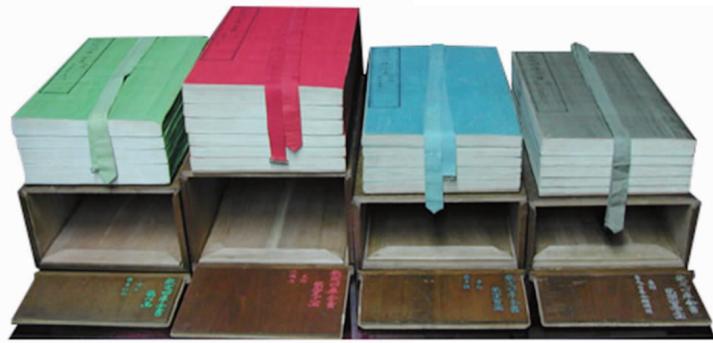
太行行政公署解运《赵城金藏》护照

高度重视。

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央财政拨款的《中华大藏经》的编纂工作正式启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主持这一重大古籍整理项目,时任社科院宗教所所长的任继愈先生任主编,该大藏经的汉文部分就是以《赵城金藏》为蓝本,用现存的8种古旧版本大藏经为校本精细校勘而成的巨著。

仿真《金刚经》凸显珍宝风采

2008年,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按原样复制,影印出版了《赵城金藏》,还精心挑选其中的《金刚经》一卷,仿真出版,随书赠送,使广大读者得以窥这一稀世珍宝的真风采。《赵城金藏》的出版,为学界研究、信徒研读、广大民众赏析这一佛教经典提供了巨大便利条件。



文津阁《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内文展示



敦煌遗书《律藏初分》

把握时代脉搏,让古籍活起来

多措并举推进古籍保护工作

古籍藏用并重,相辅相成。为进一步让读者走近古籍,让古籍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与利用,“4·23”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本报邀请图书馆长、各省古籍保护中心负责人、高校古保所所长以及专家学者围绕“让古籍中的文字活起来”这一主题共话古籍传承推广之道,为古籍阅读推广活动的开展提供新思路。“让古籍中的文字活起来”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加强古籍保护修复、构建人才支撑体系,需要把握时代脉搏、立足群众需求,需要丰富传播渠道、创新宣介方式……只有全方位、多层面地辛勤耕耘才会拉近读者与古籍之间的距离,让古籍在中华大地上真正活起来。

周德明： 多方位立体化展现古籍魅力

上海图书馆是中华古籍收藏的重镇,所存170余万册古籍具有类型丰富、善本众多、特色鲜明等综合优势。自2007年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以来,我们努力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在全国古籍保护中心的领导下,不仅保质保量完成清点、编目任务,而且注重整理、研究、开发、推广工作,以多方位、立体化方式展现古籍内容和形式之魅力,传承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十多年来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

古籍采集

与当下多数图书馆几乎不采古籍或有机会时偶尔为之不同,我们每年均留有预算,主动寻觅,多方采集。既有常规渠道采购,如年均能收回家谱5000多册,也有通过拍卖、转上、受赠方式获得各类古籍,如2014年6月获赠晚清重臣张佩纶尺牍4800余通,手稿日记170册;2015年底接受美国翁万戈先生捐赠的《翁同龢日记》稿本等一批历史文献,这是继2000年“翁氏藏书”后又一次中华古籍的“海外回归”,引发很大的社会反响。对于古籍资源建设,我认为应将它作为日常工作连续进行。固然,它同政府支持、图书馆地位和财力有关,但更与古籍整理、研究、宣传推广的实力和成就密切相关,只有倾情倾力于后者,才会有所收获。

古籍修复

受制于存储条件和自然原因,古籍修复是各收藏单位的一项不可回避的工作。自上世纪50年代始,上海图书馆一直都没有专门部门和专职人员从事修复作业,数十年未曾中断,修复技艺已传承至第四代。如今活跃于全国各地“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和各类培训班的导师(或讲师)多是上海图书馆培养的员工。从公布的全国古籍修复数量来看,上海图书馆修复的古一半以上。值得一提的是,从2011年起,我们每两年一次,已举办了四次针对40岁以下青年修复师的“上海市古籍修复技能竞赛”,聘请专家现场点评辅导,交流心得,提高技艺,培养队伍。我们借鉴世界上先进的修复科研成果,引进纸张修复机、显微纸纤维分析仪等设备。并且,研制的古籍保护产品——防霉纸,被海内外许多机构所用。对此,我最大的感悟是,事关古籍寿命、文化传承的古籍修复不能中止。上海图书馆之所以能在最近十几年里成果累累、广受称赞,与古籍界处于“低潮期”时的坚守、保留传承“种子”等因素密不可分;传统修复技艺由师徒口

整理研究

授相传之法仍得保留,因为该技艺难以仅通过听课、看书而获得。同时,现如今尤其要注意借助科技手段充实、丰富修复技术和方法,使之更加完善。

乘中国古籍保护中心统领的古籍普查、编目之东风,我们在按要求进行相关工作,完成上传十一多万种书目数据的同时,尤其注重对馆藏未编古籍的清点和整理,提高年轻员工的专业能力。这些年,既有从故纸堆中发现一些价值甚高的古籍,如明前期刻本《新刊古论精粹》等,被鉴定为稀见版本;如清抄本《资治通鉴续编》首册,恰补齐本馆旧藏;如宋刻本《杜工部草堂诗笺》、元刻本《书集传辑纂注》均为存世罕见善本,具有极高的文物、文献价值。我们倡导员工以岗位要求为本,实施魅力与整理并行,馆方命题和自行选题相结合的策略,在整理基础上研究,将研究之功体现于整理过程,使员工的专长在完成课题、项目中充分发挥。我们每年举行各类学术研讨会、座谈会和专著“上海图书馆首发”仪式,鼓励员工参与交流并发表研究成果,由此催生了一系列整理研究著作的问世。如《明清稿抄校本鉴定》、《神帖鉴定要解》《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纸色斑斓》《屠寄评传》和《虎溪斋藏清朝名贤手札》等,均受到学界关注与好评。

服务出版

收集、修复、整理古籍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上海图书馆一贯强调“保护为先,服务至上”的理念,其主要服务方式有三类。其一,阅览室“纸电互补”服务。眼下我们已完成各类古籍数字化扫描约3000万拍,建成馆藏历史文献统一检索服务平台,并提供复制服务,此举已能满足绝大多数读者的阅读和研究需求。若确因工作之需,也能根据实情为专家提供原件。其二,互联网线上服务。2015年5月,上海图书馆尝试将包括宋元本在内的馆藏古籍、家谱等数字资源公布于官网,开创了国内古籍全文上网服务的先河。目前,以家谱为例,共有五批8500多种先后上网供查验之用,赢得众多读者点赞。其三,将珍贵古籍化身千百。近十数年中,基于古籍整理,我们自主编辑出版了一批珍本古籍,数量近百种,达数千册,如《翰墨瑰宝——上海图书馆珍本碑帖丛刊》《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盛宣怀档案选编》《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尺素风雅——明清彩笺图录》《四欧宝笈》《中国家谱资料选编》等。这些精选辑印

的馆藏,或为学界提供第一手资料,或为读者学习、鉴赏古籍提供样板。上海图书馆也由此获得了数十项国家等级的奖项,仅以近两年的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而言,就有一等奖6项、二等奖4项。

对此,我们的经验是,在古籍服务出版方面必须破除“秘不示人”的旧习,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提倡以保护为前提地使用古籍的理念。只有保护好、整理好,才有可能使用好;而只有使用好才能充分体现古籍的价值。同时,要注意用各种不同的服务方式去满足读者各种不同的需求。

展示推广

自2005年起,上海图书馆奉行“揭示馆藏精品,弘扬中华文化,服务社会大众”的宗旨,在国内图书界界首创馆藏精品年展方式。每年选一个专题,汇集馆藏珍本作展,围绕该专题举办学术研讨会和系列讲座,并将整理研究成果集结出版。如此一来,既有深度研究的成果交流,触碰学术高度,又有介绍、普及古籍知识的服务,满足大众需求。

十多年来,馆藏善本碑帖、明清名家手稿、历史原照、盛宣怀档案、家谱、宋本、尺牍、稿本日记、人物文献、翁氏藏书、张元济文献等一一亮相。展览期间,还分发介绍展品的折纸、散页,每天定时安排专家现场讲解,满足了读者近距离观赏古籍,深入了解相关知识、感受中华传统文化魅力的需要。如此多视角、多层面地揭示馆藏古籍的年展,一次次引发了读者对古籍的兴趣和热爱,参观人次一再刷新。如去年的古籍装潢艺术展还屡屡出现排队候场的现象,图录售罄,展览不得不延期三天。此外,上海图书馆还特别注重结合时事、古为今用。如2014年,趁《中国家谱资料选编》项目进行之时,结合时政宣传,我们从存世的数百部家谱中撷取部分精华,分孝顺、修身、和睦、敬业、治家、爱国、诚信、教育、守法、廉洁十类。这十类内容直观地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文明传统的关系,让读者从文字精髓且通顺易记的家训族规中感受到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为此,几十家图书馆等机构争相要求巡展,影响广泛。2016年7月7日,我们同本地新媒体“看看新闻”合作,连续八小时直播“走进上海图书馆:古籍背后的故事”,现场展示古籍修复、整理、碑拓、书库管理、善本讲解等读者不易看到的工作场景和内容,令数万读者在线观看,并由此更加了解古籍和传统文化。

此外,自2016年始,我们每年举办一次开放数据应用开发竞赛,先后将家谱、名人手稿、档案数据以及相关开发工具和平台



周德明
上海图书馆副馆长
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副所长

等悉数开放,面向全社会征集以平台数据为基础的优秀移动应用产品原型或服务创意。三年间,吸引了上百个海内外团队踊跃参与,不少创意和资源已被吸收,融入上海图书馆的服务之中。

上述案例均有近距离、现场感强、互动性多的特征,让读者先走“近”古籍载体再走“进”古籍内容。专家从引人入胜的故事着手,标注精彩要点,阐述古籍知识,弘扬传统文化。在互动方式上,我们有时利用IT技术为读者获取展品信息架设平台,只要扫描二维码便可将展览内容带回家;有时利用微信公众号开设有奖答题栏目,请读者辨认文字、回答古籍问题。我们努力将平面图书立体化,让典籍由厚变薄,使文字、信息鲜活而灵动,外加受益于各类媒体大篇幅图文并茂的报道,令普通读者乐于接受并积极参与。

数字人文

2015年,正值数字人文技术兴起,上海图书馆即尝试将其植人家谱整理、研究与服务之中。以前期数字图书馆建设中累积的书目数据和全文家谱为基础,通过语义技术实现数据关联,把家谱信息单元细致化,令知识组织语义化,使知识呈现可视化,从而达到从元数据记录和数字化全文中提取知识的目的。

(下转15版)

郑智明： 让古籍焕发新的风采

抓住古籍传承推广新机遇

中国古籍传承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 and 崇高的精神,是中华文明的结晶。守护中华民族珍贵典籍,是历代有识之士的共识,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职责。新形势下做好古籍传承推广工作的机遇主要有:

一是领导高度重视。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古籍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曾先后作出批示,要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古籍保护的春天来了。

二是政策导向明确。“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自启动与实施以来成效显著。2017年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布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对古籍保护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还被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100个重大项目。

三是法律坚实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的颁布和实施,为今后进一步推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做好古籍保护与传承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让古籍保护工作有法可依,可谓为中华古籍保护事业历史发展的里程碑。

持续加大古籍整理与保护力度

近年来,福建省图书馆紧紧围绕着古籍普查登记、保护修复、整理出版、人才培养等几个方面,着力持续加大古籍整理与保护的力度。

一是制定工作规划,明确阶段性工作目标。2012年,文化部办公厅下发《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的通知》,我馆认真贯彻落实有关精神,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先后制定福建省古籍保护工作“十二五”“十三五”规划,积极推进全省古籍普查登记工作。2015年3月,我馆在省内率先完成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并编纂出版《福建省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共计收录馆藏中文古籍15544条目。

二是积极挖掘馆藏,实行文献再生性保护。我馆在古籍普查登记工作中,探索出古籍数字化与整理开发工作相结合的路子,很快就有一批成果呈现出来;2013年至2019年初,先后整理出版了《玉枕兰亭序玉版十三行合册》《多宝塔碑》两部珍贵拓本,以及《福建省图书馆藏稀见书目志丛刊》《林则徐云左山房二种》(一函二册)等图籍。《丛刊》首次将馆藏闽省公私藏书目、题跋、金石目录等20种公开出版,裨益学界。同时,我馆还与兄弟省馆及其他社会机构加强合作,联袂整理开发馆藏古籍,如2015年与江西省图书馆联袂再造馆藏明万历刻本《南泉慈化寺志》,2016年与福建

(上接14版)

以胡适家族的“上川明经胡氏”迁徙为例,依据家谱数据即同一始祖多种家谱中的先祖以迁徙事件为链接点,将人物、时间、地点要素关联,借用可视化工具,完整展示了胡氏始祖胡昌翼在唐宋自长安迁徙婺源开川,其后代又从考川迁至绩溪等不同居住地的路线图。数字人文技术还有较强的聚类与比较等,

省方志委合作开发出版明末祁氏澹生堂抄本《瀛涯胜览》,这两部古籍皆入选第4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馆藏珍本。通过优选主题并适时整理开发与出版,让馆藏古籍“化身千百”,真正成为研究界的实用文本,响应和实践“让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的号召!

三是加强古籍保护修复,保障人才培养环境。我馆曾于上世纪末大规模修复了破损古籍,尤其是善本古籍。近年来,我馆继续开展古籍修复工作,共修复馆藏古籍13900多筒子叶。2016年10月18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我馆成立“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福建传习所”,聘请上海图书馆资深传拓专家邢跃华为传习所导师,以“师带徒”形式开展古籍修复和传拓技艺的培训暨传承工作,着力培养我省古籍修复人才队伍,迄今已举办三期福建省传拓培训班,为我省培养了一批传拓人才。

打铁还靠自身硬,我们仍在不断努力提升自身技艺。2017年福建省古籍保护中心(福建省图书馆)推荐“福建古籍修复技艺”上榜《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8年省中心修复师林凤坡评选为福建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古籍修复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我省古籍修复事业再上一个台阶。

四是开展社会合作,多途径构建古籍保护体系。福建省古籍保护中心积极拓展社会合作面。2016年3月至今,与福建艺术学院职业学院合作,在该院开设“纸质文物修复”专业课程,培养一大批古籍修复人才;策划并实施了在全省范围内逐步构建和完善“国家-省-市-三级架构”的古籍保护体系,建立“福建省古籍保护中心三明学院古籍修复站”,持续推动我省古籍保护事业深入发展。

积极进行古籍保护的宣传与推广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古籍,阅读古籍、保护古籍,我馆积极进行古籍保护的宣传与推广。

一是形成行业共识。为加强全省各收藏单位凝聚力,促进省内古籍保护工作协调发展,我馆设立和发布了“福建省古籍保护中心”网页,同时还编发了《福建省古籍保护工作简报》(1~10期),及时向各级领导和省内外公古籍保护中心通报我省古籍保护工作动态与最新进展情况,提升了全省古籍保护工作从业人员的共识。

二是积极面向社会开展古籍保护宣传。充分利用“世界读书日”“文化遗产日”“图书馆服务宣传周”和“文化三下乡”等重大纪念日与活动日,积极宣传我省古籍保护理念和成果。如2011年我馆百年馆庆之际,编纂出版了《福建省图书馆馆藏珍品集

折功能等,可为研究提供各种帮助。

正是从这个项目中尝到了甜头,2017年,我们着手建设“上海图书馆古籍联合目录及验证平台”,这是一个可将不同来源、不同格式的古籍目录、元数据记录、古籍全文和各类知识融为一体的古籍数据服务平台,现收有1400余家机构的60余万条古籍书目数据和部分古籍全文,依此可实现不同版本古籍分类和提要的聚类与比较等,

萃》一书,并举办“福建省图书馆馆藏珍品特展”,展出了入选第1~3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馆藏珍籍和部分稀见地方文献;2012年“世界读书日”期间,我馆举办“特藏·藏珍”展览,主要宣传介绍了“中华再造善本”,以及地图、碑拓、契约、木刻石板等多种文献载体,深受社会各界好评。

三是不断丰富宣介方式与手段。作为省内富藏大馆,福建省图书馆始终秉持“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理念,充分利用馆藏资源,积极向社会宣传“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辛勤可爱的修复师们,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还积极参与省厅及馆里组织的活动,向社会展示她们的技艺——镜芯、线装书的制作,修复古籍书叶,以及版刻刷印等,每场活动都吸引到社会各界的参与,小到五六岁的孩童,大至七八十岁的老耆都兴致勃勃地争相“学艺”。省内多家媒体也第一时间报道了我馆举办的各类活动,客观上传播了我馆古籍保护工作成果和理念。

利用新媒体创新宣传手段

福建省图书馆积极探索和实践,拓展并利用各种新媒体宣传手段,加强古籍保护宣传推介。

一是建立新媒体传播渠道。及时更新“福建省古籍保护中心”网页动态,同时依托官方微信、微博宣传全省古籍保护成果。2014年伊始,我馆整理出版了《福建历代乡规民约》,并借助官方微信向公众推出传统文化讲座《法规祖训、乡规民约与祠堂文化》,借此宣介与呼吁公众加强传统族亲文化的纽带,凝聚中华民族共识尽责尽力。

二是积极策划能够激发大众参与的活动,借助各种媒介传播正能量。在官方微博和微信与读者分享阅读快乐,不断推出古籍相关讲座、活动的预告;清代书法家郭尚先在闽行迹、苏轼的诗词和他的人生,严复个人经历与侯官新学的创建,我省参加“我与中华古籍”创客大赛作品,《西游记评注》孙悟空形象的雕版等;2017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举办“晒出你家的珍宝”活动,报名作品近2000件,票选市民近万人,活动当天12位持宝人在闽园晒出珍藏多年的“故纸”类宝物,与市民面对面交流,让公众感受“人人是保护文化遗产的宣传员”责任。

时代在不断地发展,公众对于资讯的获得也更加多样化。福建省图书馆建馆108年,相较于古籍而言还非常年轻,我们希望能通过借力新媒体,让古籍焕发新的风采。

迎难而上,拓宽有效推广途径

现阶段,古籍推广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以下两点:

辅助基于古籍考证的版本学、校勘学等研究,借助现代科技进行古籍整理研究,令人兴奋和期待,现已有初步成绩。对此,希望古籍专家能更多地用新技术“武装”其专业知识,使两者产生“化学反应”,显现更多的新成果。

“让古籍中的文字活起来”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全方位、多层面地耕耘才有可能达到目标。其中,具有一支古籍敬业的专家

队伍是必需,具备坚守传统文化之心和持续创新之力是关键,增强开放意识、掌握推广传播技巧是不可或缺的要素,而新技术的融入势必成为重要的助推器。

这些年,上海图书馆的努力只是朝着这个目标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必须增强责任感,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以更扎实的步调前进,使中华典籍代代相传,使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



郑智明
福建省图书馆长
福建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

一是缺乏古籍宣介与推广的营销型人才。面向大众的古籍推广工作仍需甄选题材及受众喜爱的形式,研究性的题材及本学者钟情但普通读者难以适用。

二是围绕古籍宣传的通俗资料编辑整理能力不足。对古籍的挖掘与揭示手段尚不丰富,为此,需要加大相关调研工作,拓宽视野。

做好这一工作除需加强古籍研究与整理工作外,还应加大政策和经费扶持力度,鼓励收藏单位的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培养古籍宣介与推广的营销型人才。

古籍推广的有效途径,个人认为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

一是目录指引。加强对馆藏古籍的充分揭示与广泛宣传,让读者知道图书馆藏有什么,如何利用,更加便利地找到所需的资料。

二是设计趣味话题导读。如讲述古籍背后的故事、古籍中生动的人物话题等,引发读者的兴趣与关注,从而拉近读者与古籍之间的距离。

三是多途径揭示。不囿于传统的宣传手段,利用网络、新媒体、VR/AR等新技术手段揭示,在扩大古籍宣传面的同时,增进古籍的易理解性。

四是增强体验感。通过传拓、刷版等形式的活动,以及体验性产品开发,让读者在体验中了解古籍、认识古籍并更进一步地理解古籍。

姚伯岳： 古籍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党和政府重视，人民群众有兴趣，青年学子有参与的意愿，相应的教学机构和教学计划陆续设置和实施等，是新形势下做好古籍传承推广工作的机遇。

从2015年起，天津师范大学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大力支持下，组织本校历史文化学院与图书馆合作培养古籍修复和出版方向的专业硕士研究生，迄今已毕业2届学生共11人，目前在校学习的有2届学生共16人。2018年5月9日，天津师范大学又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支持下，成立了组织关系挂靠图书馆的古籍保护研究院，使之成为紧邻首都的国家古籍保护人才培养基地、科研机构和国家智库。

古籍和古籍保护要做好宣传推广。2017年11月，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古籍保护志愿服务专业委员会成立并挂靠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同年，该委员会在天津师范大学学生中成立了古籍保护志愿者委员会，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古籍保护志愿服务工作。2018年暑假，委员会组织学生参加山东省图书馆的古籍普查编目工作，帮助该馆对馆藏未编目古籍进行编目。学生不仅丰富了古籍知识，得到了很好的锻炼，而且提高了从事古籍保护工作的能力。

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的培养对象是硕士研究生，但我们也很重视在本科生中进行古籍和古籍保护的宣传推广工作。2018年古籍保护研究院成立后，积极

协助图书馆组织本校学生成立了蒹葭读书社、古籍保护学社等学生学术社团，开展了一系列古籍保护宣传推广活动，如讲座、读书会、外出参观考察等，让古籍和古籍保护的知识和意识深入人心。此外，古籍保护研究院还开设了全校性通识选修课《古籍与古籍保护》。全校本科生踊跃报名，认真上课听讲，并对该课赞誉有加。

信息时代，新媒体具有知识信息传播速度快、贴近读者需求和兴趣爱好，图文并茂、形式多样的优点，是开展古籍宣传推广工作的好工具。许多古籍方面的微信公众号如“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善本古籍”等，既及时报道古籍保护的最新消息和进展，也传播许多古籍和古籍保护知识，读者爱看，社会影响大，宣传效果好，值得学习和效仿。

现阶段古籍推广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有：

1. 缺少一份有影响力的古籍推广刊物，古籍方面的大家、名师参与度不高。社会对古籍的认知度不高，对古籍的内容和形式缺乏深入的了解，还停留在好奇、好玩的阶段，没有产生发自内心的对丰富古籍遗产的自豪感和自觉应用的现实感。

2. 古籍收藏机构对古籍秘而不宣的倾向仍很严重，缺乏为当代公众服务的意识。部分古籍收藏机构打着保护古籍的旗号，拒绝为读者服务，为学者利用古籍设置重重障碍，不让有必要需求的研

究者看到原版古籍，不为也不许研究者扫描、复制古籍，令学者对利用古籍望而生畏，挫伤了人们利用古籍、推广古籍的热情和积极性。

古籍是有生命的，有生就有死，想让古籍长生不老、永远不死是不可能的。古籍保护的使命是尽量延续古籍的生命，同时有效传承其内容和形式。古籍保护既要为古籍延年益寿，也要服务当下，为今天的人民大众服务，这是古籍保护的宗旨。

所以，我认为古籍是全民的财产，一定要破除利用古籍为本收藏机构牟利的陋习。要鼓励古籍收藏机构和古籍利用者签订协议，可以限制古籍利用者所复制之古籍的流通范围，但不能无理拒绝学者的复制要求，不能收取高额的古籍复制底本费。

要鼓励古籍收藏机构彼此交换多余的复本，在国家权威机构的监督下，建立古籍复本交换的平台。

古籍保护工作要规范，要立法，要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不能因人而异，不能随心所欲。要限制古籍收藏机构随意处置古籍的权利，要保障古籍利用者合理利用古籍的权利。

古籍不是我们的历史包袱，而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它是我们民族智慧的源泉，是我们民族自信的保证，是我们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中国人民乃至全人类的精神食粮。古籍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古籍保护工



姚伯岳

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天津市特聘教授

作者所从事的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必须要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要有国际的视野，宽广的胸怀，服务人民的意识，无私奉献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无愧于人民授予我们的这份权利。

万群： 让古籍更好地服务大众

我的老师杜伟生先生曾经在他的文章里提到过，据统计，2005年前全国范围内从事古籍修复的技术人员不超过100人，而今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全国就设立了12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已有166家单位入选“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还成功举办了100多期古籍鉴定、普查、保护、修复等方面的专业培训，仅以这种方式培养的古籍保护人员已经达到6400余人。如此丰厚的成果首先应得益于“中华古籍保护计划”。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以来，在文化部的正确领导下，“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已顺利走过了10年，成绩斐然。这项事业不仅是图书馆界自身的努力，更仰赖于国家顶层设计的优化。每位古籍保护工作者，有幸参与其中，都能感获颇深。天津市古籍保护中心的各项工作也同样离不开政策的支持和领导的帮助。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国家文化发展时指出，要“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我是一名古籍修复师，也是一名共产党员，要怎样回应总书记交给的任务？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古籍保护工作，并向民众积极宣传推广古籍？这自然成为我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特别是当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认为美好生活需要包含很多内容，其中必然要有精神文化的需求。而古籍作为中华民族5000多年历史发展中创造的重

要文明成果，是民族之精神，文化之灵魂，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树立文化自信的根基所在，绝不应被束之高阁，而应是普惠人民之物。只有善用古书，善守古籍，让每个中国人都能有机会了解自己的文化，进而研究自己的文化，最终由衷地热爱并继承自己的文化传统，这才能真正回应总书记的期待，使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任务如此重大，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有清醒的认识。我认为现阶段古籍推广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方面，古籍保护专业人员的数量相对于庞大的待修古籍藏量，仍有较大缺口，同时人才的培养模式有待创新。近日，在天津图书馆召开的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古籍修复技艺专业委员会会议上，专家代表一致反映，现阶段的古籍修复人才培养中，缺乏研究型人才的培养，尤其是高层次的古籍研究人才和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人员。另一方面，古籍宣传力度有待加强，但实际情况是，大部分现有古籍保护人员并不具备对外宣传能力，也缺乏宣传推广意识，我想这也是行业的“匠人精神”使然，因为只有坐得住，静得下，才能修好书，护好书。因此，应强化机制，引入媒体，利用其专业高效的人员和设备，在发挥宣传推广作用的同时，也能将古籍修复方法、技艺留存，为“修复存史”。

再谈谈如何能让古籍更好地服务大众的问题。我觉得，方法会有很多。例如可以尝试将修复完成的普本古籍，分阶

段向读者开放，使读者能熟悉古籍、阅读古籍，进而培养保护古籍的良好意识。而善本古籍，据了解，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已于2017年2月28日、5月25日，先后联合首都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山西省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等10家单位在线发布古籍数字资源超过2.8万部，其中“中华古籍资源库”在线发布国家图书馆藏善本古籍影像总量达到1.7万部，古籍资源共享已形成全国联动的新局面，读者完全可以坐在家中浏览古籍，资源利用十分便捷，这就值得大加称赞。

作为一名从事多年古籍保护工作的文献修复师，我常以三修告诫自己，即“修书、修身、修性情”。前辈老师多年的言传身教，给了我“修书其实就是在修心”的理念，我当然也会把这种精神传给我的徒弟们。天津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这些年来，真正做到了“用心在修书”，日常除需保护修复天津图书馆馆藏各类古书之外，还陆续承担起保护修复天津北疆博物院、北京市文物局、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等公藏单位大批量的古籍藏品，成果均得到认可。这些成绩与我馆领导的支持，与我们这个年轻的古籍保护团队努力学习、积极向上的情怀分不开。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领导下，参加或举办过多次古籍保护成



万群

天津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国家古籍修复技艺传习导师

果展览，借此向读者展示古籍修复这门古老技艺。我们发现来观展的读者都抱有极大的热情，都十分愿意去了解，去接触。这样的活动今后我们还会多办，满足广大群众对文化的需求，努力担负起我们这一辈古籍保护人的职责。